

利益集团形成机制探索： 从多元主义到集体行动理论

高 春 芽

[摘 要] 多元主义理论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自愿组建利益集团。而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人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除非实施选择性激励,潜在集团不可能转变成组织化利益集团。通过使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引入集体物品的概念,集体行动理论推动了集团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利益集团;多元主义;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2-0237-04

利益集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它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提供了群体协作或对抗的组织形式,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常规渠道。政治学界在研究集团理论时,主要关注利益集团的社会政治功能,比如在利益表达、议程设定中发挥的作用,而较少关注利益集团的产生过程。本文尝试总结多元主义和集体行动理论对利益集团形成机制的探索,并论述集体行动理论对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贡献。

一、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发生论

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扎根于美国思想演变的历史土壤中,建国之父们在设计 1787 年宪法时,就已经对利益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有所认识。麦迪逊曾经指出,利益集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人的自利性,人们无法根除集团冲突但可以控制它们的消极影响。在代议制共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多元竞争不仅可以限制少数人的狭隘要求,而且能够避免多数人的暴政。进入 20 世纪,随着本特利《政府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和杜鲁门《政治过程》的先后出版,多元主义集团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本特利论述了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内部结构等问题,认为除非人们研究集团行为,否则就无法研究政治过程^[1](第 209 页)。他假定政治生活具有“趋向稳定—干扰—反抗”的自我平衡倾向,一旦社会中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利益集团就会产生并采取集体行动恢复原有的平衡^[2](第 398 页)。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潜在集团将自然转变成组织化利益集团^①。

在本特利之后,杜鲁门成为美国集团理论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他甚至被视为真正的集团理论之父^[3](第 15 页)。杜鲁门比本特利更为详尽地解释了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分工和利益分化需要利益集团行使整合功能;另一方面,新生利益集团又干扰了其它潜在集团,从而刺激更多利益集团的出现。杜鲁门指出:“不断提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分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活动链条的不同阶段上形成各种各样的集团。”^[4](第 60 页)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为人们沿着职业或行业界限组建利益集团创造了条件。然而,在社会异质性提高的同时,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在增强。利益集团能够协调其成员间利益关系,但也会干扰其它集团的内部平衡或加剧其分裂,这又催生出新利益集团。社会环境的变迁促使新型利益集团的出现,而它们的存在又推动了其它利益集团产生。社会环境系统与集团系统之间的联通,造成利益集团的“波浪式发展”^[4](第 86 页)。在微观上,潜在集团转变为组织化利益集团,实现了成员之间的利益均衡;在宏观上,利益集团的波浪式发展最终也要实现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

在杜鲁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解释利益集团产生的假说:“衍生理论”(proliferation theory)和“平衡理论”

(equilibrium theory)^[5] (第 3 页)。衍生理论认为,社会分化是推动利益集团产生的直接动力。随着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领域出现了新生利益共同体,他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纷纷组建利益集团。以农业部门为例,商业化导致农场专业化,农场主由于种植或养殖的不同而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农场主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利益集团提供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组织形式。衍生理论从时间纬度解释利益分化和聚合对利益集团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对,平衡理论假设在已有社会集团中存在利益平衡,而战争、移民、市场周期等因素干扰了原有的平衡机制,建立利益集团是平衡机制被打破引发的社会回应。利益受损的群体通过建立利益集团,能够加强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提高集团的凝聚力,也使利益共同体处于更加有利的博弈地位。平衡理论和衍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前者将利益集团视为活跃的社会组织,而后者则认为利益集团具有不断增加的自然趋势^[5] (第 5 页)。

二、集体行动理论的利益集团发生论

多元主义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解释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成为 20 世纪集团理论的主流。人们能够为实现共同目标志愿组建利益集团,这不仅是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体现,它还是政治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几乎在杜鲁门提出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同时,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正兴起一场方法论革命。经济学家将理性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拓展至社会政治领域,认为人们的非市场行为也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指出,组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以实现共同目标,这等于为相关群体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集体物品,理性的集团成员将“搭便车”^②。由于每个成员都抱有此种动机,他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除非群体的规模很小,或存在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集体目标行动,理性人将不会参与利益集团活动。

在批判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发生论的同时,奥尔森开始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探索利益集团产生的动力,提出了“新的压力集团理论”——“副产品”理论(by-product theory):“大型经济集团的游说活动是有能力以‘选择性激励’来‘动员’潜在集团的组织的副产品。”^[6] (第 132-133 页)他认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涉及两个阶段:首先,在群体中形成领导性组织,然后通过实施选择性激励吸引成员加入,将潜在集团转变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并采取游说活动,这以实施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作为先决条件。不同于集团所要实现的目标,选择性激励是针对集团成员个体的激励,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施加强制和提供收益。通过实施选择性激励,潜在会员的激励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他们将抑制“搭便车”动机,转变成利益集团的正式会员。

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排他性的集体物品,这导致利益集团的政治职能即使符合集团成员的利益,也不会得到他们的物质支持,因为非贡献者也可以自动分享游说活动取得的成果。如果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行使其他社会职能,它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美国的律师、医生等行业利益集团由于行使发放营业执照等职能,所以能够实行强制入会制,进而采取游说政府的集体行动。与采取惩罚措施相对,还可以通过提供收益的形式吸引潜在会员加入利益集团。美国的农业利益集团为其成员提供农产品销售信息、技术服务,劳工利益集团为其成员提供求职信息、职业保险,这些均是非会员无权分享的私人性收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出现并行使游说职能,就在于它并非纯粹的政治组织,它在游说政府的同时还向其成员提供经济服务。在“副产品”理论中,有一种针对利益集团的“去政治化”色彩: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政治职能)是选择性激励(经济职能)的副产品,人们支持和参与利益集团并非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而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

三、集体行动理论对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发展

集体行动理论虽然从本特利等人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重要概念,如潜在集团等,但它对多元主义理论体系持否定态度。集体行动理论抨击了多元主义者的乐观论点,即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将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促进这些利益。奥尔森认为政治学中充斥着时髦一时的术语,多元主义集团理论已经过时,并被其它理论所代替^[7] (第 166 页)。这“其它理论”首先是指奥尔森提出的“副产品”理论。“副产品”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引入集团形成过程的研究中,尤其是使用集体物品这个重要概念,为批判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提供了支点。政治学家莫(Moe)认为:“奥尔森的成就在于使政治学家充分认识到集体物品对于分析问题的重要性。结果,他显示了一个‘经济’概念如何转换成一个‘政治’概念,为研究政治行为的激励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8] (第 23 页)

(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

集体行动理论表明,共同利益并非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除非依赖选择性激励,大集团就必定是潜在集团而不能转变成组织化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理论依据理性人假设分析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标志着利益集团发生理论从宏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

无论是本特利还是杜鲁门,他们都是从“需求”的角度解释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结构的变迁或利益关系的失衡需要利益集团的出现以行使整合功能,所以利益集团适时而生^[9](第122页)。这种解释模式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是一种“宏观水平”的解释,其优点是重视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对利益集团形成的外部刺激^[10](第66页)。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忽视了“供给”问题,即潜在集团如何自我组织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在相同的环境中,为什么有些潜在集团能够组织起来,而其它的集团却不能呢?多元主义理论对此并不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多元主义理论的宏观水平的解释相对,集体行动理论是“微观水平”的解释,它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利益集团是否产生并非社会变迁干扰的结果,它与潜在集团中能否产生选择性激励有关。集体行动理论是从“供给”而非“需求”的角度解释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它关注的中心问题并非社会变迁引发的外部刺激,而是集团内部的组织过程。由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独特贡献,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从外部需求和内部供给两个方面审视利益集团产生的均衡过程。

(二)研究方法的转变:从集团分析到方法论个人主义

本特利认为多元主义理论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集团分析方法,将集团而非个人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人们虽然可以从个人和集团两个层面研究政治过程,但“前者对于解释社会无足轻重;后者才是基本的、第一的、最后的和贯穿始终的”^[1](第215页)。集团分析是对17世纪以来契约论者用自我保存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解释人类行为的“反动”,它反对世俗的个人优先于社会的假设。为了将个人纳入集团分析的框架,本特利不得不把个人也看作特定类型的集团,认为诸如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样的精英人物的活动本身是一种集团活动,他代表的是千百万美国公民。本特利声称政治只有从集团的角度才能够解释,杜鲁门随后提请人们注意被忽视的集团的重要性,他秉承集团分析方法,认为“无法在集团之外找到个人的影子”^[4](第52页)。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个人并不存在,人们无法从个人的特性推论出集团的特征。

多元主义集团理论使用的概念,诸如压力、系统等,显然受到物理学的影响,它以力学的眼光看待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平衡^[11](第944-945页)。集体行动理论则是以经济学的方法解析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经济环境是影响利益集团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它对理性人假设和理性分析持否定态度。杜鲁门认为政治学中迟迟未能产生集团分析的方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相互混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若隐若现地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不管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都被假设为运用着‘理性选择’,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独立行动着。”^[4](第14-15页)与将集团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不同,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个人才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实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基本的研究方法^[12](第77页)。仅仅依据集团的特征或性质无从分析成员的差异性对集团活动的影响。多元主义理论将由不同成员组成的群体人格化,认为他们可以像个人追求私人利益那样,自愿创建利益集团,维护集体利益。而集体行动理论则认为,潜在会员是否加入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这完全是个人理性计算的结果,集体利益并不足以促成集体行动。虽然多元主义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都研究人的行为,但前者关注政治过程中的集团行为,而后者关注集团过程中的个人行为。

(三)研究重心的转变:从强调行动倾向到重视组织过程

索尔兹伯里指出,直到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以后,集团理论研究者才开始关注集团如何组织化为社团并采取行动^[10](第65页)。多元主义集团理论存在乐观主义倾向,认为潜在集团在社会结构变迁时能够组织化为利益集团,它们潜在的社会力量将转化为影响公共政策的政治力量。本特利虽然意识到成员数量、利益强度和组织是影响集团行动的三项因素,但他并未将组织过程的重要性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反而认为人们在共同利益受损时具有“行动的倾向”(tendency to action)^[1](第226页)。杜鲁门也多次声称,“组织化集团……仅代表了交往的某个阶段或某种程度,这一阶段也许重要,也许并不重要”^[4](第56页)。多元集团理论认为利益集团能够自发产生,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在创建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将面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搭便车”将瓦解集体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首先创建实施选择性激励的正式组织,克服“搭便车”,杜鲁门预言的社会干扰催生利益集团的结果将不会出现,“干扰现存的活动结构将不会导致有意义的政治抗议,而以往的稳定结构也不会得以恢复”^[2](第433页)。潜在集团能否对外部干扰作出及时回应,关键并不在于成员的共同利益是否受到损害,而在于集团内部是否可以建立集体行动机制。

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多元主义理论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利益集团形成机制的探索迈出了重要一步。多元主义理论根据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关系平衡解释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它注重利益集团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而集体行动理论通过对集团成员行为的理性分析,促使人们关注利益集团的组织过程。集体行动理论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这为批判多元主义理论提供了支持,但也导致它忽视非经济激励和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利益集团产生的影响,没有继承多元主义理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动态分析利益集团形成机制的优点。全面理解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还需要在利益集团的内部组织和社会环境变迁之间寻找契合点。

注 释:

- ① 在集团理论中,潜在集团(potential group)是相对于组织化集团(organized group)而言的。潜在集团由于没有获得稳定的组织形式,缺乏正式制度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尚未成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利益集团。
- ② 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是奥尔森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被定义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 $x_1, \dots, x_i, \dots, x_n$ 中的任何个人 x_i 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所消费。”集体物品类似于公共经济学使用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于公共物品暗示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而事实上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参与供给公共物品,所以奥尔森建议最好以集体物品代替公共物品。

[参 考 文 献]

- [1] Bentley, Arthur. 1995.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2] [美]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王沪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3] Wilson, James. 1995.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4] [美] 杜鲁门:《政治过程》,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5] Salisbury, Robert. 1969. “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1).
- [6] Olson, Mancur.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7] Olson, Mancur. 1986. “A Theory of the Incentives Faci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 [8] Moe, Terry. 1980. *The Organization of Interes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9] Nownes, Anthony & Grant Neeley. 1996. “Public Interest Group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ories of Group Mobiliz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9(1).
- [10] Salisbury, Robert. 1984.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The Dominance of Institutio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1).
- [11] Dowling, R. E. 1960. “Pressure Group Theory: Its Methodological Rang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4).
- [12] Olson, Mancur. 1990. “Economy, Logic and Action,” *Society* 27(3).

(责任编辑 叶娟丽)

Formation of Interest Group: from Pluralism to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Gao Chunya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yes of pluralism,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will force people with common interest to organize interest groups voluntarily. From the angle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the formation of interest group is a collective action involving group members, and free-riding will lead to voluntary failure. On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lective incentive, can potential group transforms into organized interest group. With the assump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goods,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propels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ism theory.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 pluralism; collective action